

# 流亡時代的香港書寫：

## 以趙滋蕃《半下流社會》與邱永漢《香港》為例

翁智琦

### 提要

本文以 1950 年代的香港書寫為比較座標，觀察趙滋蕃《半下流社會》與邱永漢《香港》這兩部以香港為故事背景的小說之異同。本文指出這兩部作品都映照了五〇年代在香港的流亡者複雜圖像。兩位作者都具備右翼的文化背景，但是他們的文學作品所反映出來的流亡者生態卻不能僅從這一角度來思考。再者，本文要探究兩部作品中展現出來的「反」之意涵以及「他者」之形象。《半下流社會》與《香港》都屬流亡文學的範疇，小說也寫出他者的形象。這種他者形象是不被接納的，意味著他們受到排擠或者有所抵抗。本文將這些排擠與抵抗，視作文本的「反」。通過「反」，「他者」的形象同時也得以被表現。這雙重的目的是希望能為文本的詮釋找到平衡。因為它們或許反共、反國民黨、反資本主義，但並不全然能被簡化為某種論述而歸之。也許在承認這些文本的反共、反國民黨、反資本主義之餘，也要關注它們跟反的一方偶爾交錯的痕跡。最後，本文則是要去考慮兩部作品的出版環境與文本產出的後續緣分。希望透過文本內緣與外緣的交叉比對，能夠構築較為立體的文學作品與時代觀察。

關鍵詞：流亡文學、冷戰、趙滋蕃、邱永漢

## 一、前言

本文以流亡文學為參照議題，試圖有別臺灣島內的反共大調。透過趙滋蕃《半下流社會》與邱永漢《香港》的比較課題，討論冷戰時代中作家被迫流亡的香港故事。從他們的作品中，得以窺見流亡者自身乃至其同代人的命運。也得以傾聽來自海外的冷戰心音。

戰後，在充滿動亂、極端動盪的五〇年代，臺灣與香港兩地，都是英美國家反共陣線的一員。當時的臺灣因為國共內戰實施戒嚴令，香港卻因中英鴉片戰爭協定而成為華人得已自由出入的地方。在冷戰結構下，香港的身份因而顯得特殊。一方面，它是被割讓、被長期租借給外國人的地方，象徵著中國民族的恥辱；另一方面，又因為它對外開放的有利條件，成為不同政治力量互相連結、角力的空間，幾乎是盧瑋樂所說的「左右逢源」（2013）。帝國主義將香港及沿海租界視作侵佔中國利益的跳板，而革命力量與受政治迫害者則以香港為串連或避難的空間。香港既接受過逃避國民黨壓迫的共產主義者，也容納過大量反共產政權的人士。

在如此動亂時代中的文學產出，大多是受政治力催逼而生。文學一旦被政治深刻介入，常常是啞巴吃黃蓮。但是在五〇年代的香港書寫中，文學卻弔詭地自有所得。這也是張誦聖於〈臺灣冷戰年代的「非常態」文學生產〉中所提及的一種「始料未及」（unintended consequences）（2011）。始料未及的成果反映出流亡文學，也開拓了冷戰時代的東亞文學場域議題。它是流亡者與流亡地的因緣發展。從流亡文學觀察它投射出的時代圖像，不僅照見殖民地歷史命運的乖舛，更有助於理解香港文學的轉向。陳智德指出：「五十年代的香港小說透過南來者的夾縫處境以及『遺民空間』的政治隱喻，完成戰後香港文學的另一種文化轉折」（2011：9）。論者在此雖是討論南來文人所寫的香港故事，但若要論及流亡，自然不限從中國大陸移居的南來者。自臺灣流離星散的遷徙者也有所謂流亡到香港的文學產出。香港既是特殊時代的相對性自由空間，理當會有多方的流亡之聲。

本文以流亡為名，香港為文本的地理空間，討論作家被時代推擠而成的作品。在這樣的時代浪潮翻湧下，被視為反共作家的趙滋蕃與鮮少被文壇注意的邱永漢都因擁有流亡香港的經驗，而各自以文學作品《半下流社會》（1953）、《香港》（1956）為自身乃至同代人的命運留下見證。

本文工作之一，是要指出這兩部作品都映照了五〇年代在香港的流亡者複雜圖像。兩位作者在輿論看來都具備右翼的文化背景（一個被譽為反共作家，一個

則以資本主義為信仰)，即便如此，他們的文學作品所反映出來的流亡者生態卻不能僅從這一角度來思考。

再進一步，本文工作之二，即是要探究兩部作品中展現出來的「反」之意涵以及「他者」之形象。《半下流社會》與《香港》都屬流亡文學的範疇，既是流亡，必有不被接納的緣故。不被接納往往意味著受到排擠或者有所反抗，兩種因素在文本中都各有所見。筆者將之視作文本的「反」。通過「反」，「他者」的形象同時也得以被表現。這雙重的目的是希望能為文本的詮釋找到平衡。因為它們或許反共、反國民黨、反資本主義，但並不全然能被簡化為某種論述而歸之。也許在承認這些文本的反共、反國民黨、反資本主義之餘，也要關注它們跟反的一方偶爾交錯的痕跡。

本文工作之三，則是要去考慮兩部作品的出版環境與文本產出的後續緣分。兩者最初發表的園地與語言都不同：《半下流社會》以華文寫成，由美新處轄下的亞洲出版社出版；《香港》則是以日文寫成，先發表於日本《大眾文藝》後又刊於《文藝春秋》雜誌。兩者的閱讀群以及作者在文壇的相關活動都是本文在進行文本詮釋的重要背景。

香港作為一割讓租借地，誠如周蕾的創傷邏輯（the logic of the wound）觀察：它象徵著中國民族的恥辱（2001）。但另一方面，它由於是冷戰時期西方陣營的殖民地，又代表著相對自由的城邦，也因此成為各方勢力的集散地。輾轉流亡至港者，多是家國與時代的遺民。他們在紛亂中遷到香港，使得香港有形無形地也跟著承載了流亡者對於時代的焦慮與困頓。這一批流亡者在香港暫時或者永久安頓（本文的兩位討論對象屬於暫時安頓），離散與在地的經驗激發了他們對於身份定位、認同危機、居住空間乃至現實政治的矛盾思考。

大環境的變動使然，流亡者夾處於新舊時代／家園之間。他們的心理質地變化便造就流亡時代香港空間的文化意涵，這也是開啟香港文學文化轉折的關鍵因素。流亡者的生活空間往往指向混亂與變動，在這裡便形成冷戰時代的另個始料未及。羅永生在《殖民無間道》指出，香港社會的主體性於此逐步地被建構起來（2007：72）。也就是說，香港的戰後發展不僅貫穿了冷戰經驗，更在國族權力之間，錯綜複雜地發展出自己的政治社群意識。因此，這段混雜的時代夾縫，不僅是地方空間關係再造的關鍵，還是影響後來香港社會運作的重要歷程。

Doreen Massey 在王志宏編譯的〈政治與空間與時間〉裡針對政治涉入空間與時間的認為政治涉入的混雜涉及了移位、自由與可能性的元素（1995：131）。使

得香港作為流亡者的空間，其實也是政治化的空間。因此，如何在政治化的空間裡找出當中的複雜作用，便是本文重要的課題。

流亡文學在香港曾因其濃厚的難民色彩而被論者有過誤差的解釋。比如黃康顯在〈從難民文學到香港文學〉中評判流亡文學是「不具香港特性的文學」(1996: 70)。王宏志在〈我看「南來作家」〉也將流亡文學視為「歧視之作」(1997: 32)。換句話說，流亡文學曾經有過一段污名的、被誤解的時期。論者認為流亡文學僅是過渡性的類型作品，在文學(史)意義上並不扮演積極角色。然而無論文學書寫地方呈現怎樣的景觀思考，作品的出現便是時代的證據、是歷史的產物。更重要的，它是以具體的存在為當地文學提供往後成長的養分。不管是以肯定之姿鼓勵，抑或否定的方式推擠，身為研究者，對於這點都無法揮手否認。

## 二、 激進的浪漫革命：趙滋蕃《半下流社會》

被定位為反共小說家的趙滋蕃(本名趙資藩，1924~1986)，因為父親在德國柏林大學任教的緣故，童年在德國成長、學習。抗戰時期回到中國，歷經數年軍旅生涯。後因國共內戰，輾轉流浪至香港。曾任香港《中國之聲》週刊社、《人生》月刊編輯，亞洲出版社總編輯兼《亞洲畫報》主編。1964年9月，因以《重生島》描寫罪犯的非人道生活，被港英政府遞解出境，移居臺灣。曾以筆名文壽在《中央日報》撰寫專欄雜文，後任教於東海大學中文系，致力於文學批評理論、文藝教育的傳播直至終老。

趙滋蕃在香港時便以《半下流社會》盛行臺港兩地。在1955年一次由中國青年寫作協會所策劃的「十萬青年最喜閱讀文藝作品測驗」的票選活動中，《半下流社會》進入最受歡迎小說的前十名。應鳳凰對此活動的目的，有所分析：

透過救國團全省分支團部，得以深入臺灣各縣市及大專院校，以票選之名，開卷有益，行推廣戰鬥文藝之實。(2007: 36)

可以說，「十萬青年最喜閱讀文藝作品」的票選活動實可視為1955年戰鬥文藝運動的最高潮，而《半下流社會》幾是反共文學代表佳作。其人其作的魅力更是跨及臺港。從一則趙滋蕃來臺訪問的報導中指出：

趙氏此行係應青年救國團之邀，返回祖國作兩週之訪問。昨日在基隆曾接受救國

團、青年寫作協會，以及自由中國藝界人士之熱烈歡迎。午後拜訪救國團，由胡軌副主任接見。今日上午將至碧潭遊覽，午後參觀台大，師大等處，明日拜會各文教機構，後日出發參觀各軍事學校，並遊覽日月潭等處，然後轉赴金馬前線訪問。趙氏並將應台大及淡江英專同學之請，分別作兩次公開演講。（聯合報訊：1956）

從報導中可見趙滋蕃不僅以《半下流社會》成為暢銷書作家，與以國民黨為指導單位的文藝界之關係也十分友好，更是當時青年學子的文藝偶像。根據關海潮在《聯合報》的報導，趙滋蕃的小說曾經造成盜版猖獗，流行廣大（1981）。但是對趙滋蕃的文學相關研究，卻幾乎被遺忘。周芬伶指出：「原因可能是在臺灣文學找尋主體與認同的過程中，趙滋蕃甚少書寫臺灣本土經驗，以及他反共立場過於鮮明有關。」（2006）可以想見，趙滋蕃的文學史地位是微妙的。他曾因寫出「政治正確」的作品享譽文壇，後又因「政治不正確」的作品被移送臺灣，更被臺灣文壇遺忘許久。

幸而九〇年代後，學界的討論逐漸打開舊時代的既定枷鎖。近年來已有論者紛紛為文重新討論趙滋蕃的文學位置與作品意涵。如周芬伶〈顫慄之歌——趙滋蕃先生小說《半下流社會》與《重生島》的流放主題與離散思想〉從反流放、反離散的角度說明趙滋蕃小說中的反叛性與現代性及其創作美學（2006）。張瑞芬〈趙滋蕃的文學創作及其時代意義〉一文中條理分明地陳述出趙滋蕃的文學活動與其創作與時代的意義（2006）。陳建忠〈1950年代臺港南來作家的流亡書寫：以趙滋蕃與柏楊為中心〉則以臺港的南來文人為座標，從趙滋蕃和柏陽的作品來開啟區域研究的比較視野（2010）。陳智德〈一九五〇年代香港小說的遺民空間：趙滋蕃《半下流社會》、張一帆《春到調景嶺》與阮朗《某公館散記》、曹聚仁《酒店》〉（2011）將香港的遺民空間文化史與文學案例相互呼應。陳芳明於《臺灣新文學史》談論1950年代的反共文學時，特別介紹了趙滋蕃及其作品：

真正使人懷念的反共文學，大多是沒有獲得官方獎勵的作品。當時流傳最廣的反共小說之一，是趙滋蕃所寫的《半下流社會》。（2011：304）

除了肯定《半下流社會》是反共文學的代表作，陳芳明對趙滋蕃的文字也頗有讚譽。認為他的文筆是反共作家中的佼佼者。

《半下流社會》取材自 1950 年代初香港調景嶺難民生活經驗。故事敘述一群以文人王亮為首的流浪漢，自中國流亡到香港的苦難故事。他們聚集在香港筲箕灣並將自己喻為「半下流社會」，在時代夾縫中重啟生活（1978：34-5）。

這群流浪漢生活窘迫，但始終不因貧困而下賤。他們個人各司其職互相扶持，集體創作、貢獻所學，時常於晚飯後一同討論哲學、政治、經濟諸多議題。與其說他們是流浪漢，也許稱他們為窮困的知識份子還來的恰當。為了賺取稿費充當公共基金，李曼（王亮女友）抄寫下每晚的討論，並具名投稿刊登。李曼因故成為文學明星，卻也因此離開王亮，陷入奢華的風暴中。李曼的離去重重打擊王亮，也影響半下流社會的士氣。風塵女潘令嫻的加入則為王亮以及整個半下流社會帶來另個黎明。故事最後以一場大火燒毀筲箕灣木屋。小說安排了沉淪與上升與沉淪兩條對比鮮明的主軸。沉淪的人（李曼）含恨而終，上升的人（王亮為首的半下流社會成員）歷經種種磨難仍能悲憤自持，並決心要以半下流社會的毅力與精神影響著下一代，永遠為自由真理戰鬥不懈。

「半下流社會」出自小說角色酸秀才一語：「半下流社會沒有上流社會的自私、冰冷，也不如下流社會的喪失理想。既遠離上流社會，又接近下流社會，是一個和諧的社會試驗室。」酸秀才點出了以王亮為首的「半下流」流亡社群，事實上是批評了上流，同時又拒絕了下流。酸秀才的發言是喻示著對於香港這個流亡空間的不滿。「半下流社會」沒有上流社會的自私冰冷，也沒有下流社會的喪失理想。它是一個理想象徵，也是縮影。因此他們用「半」，企圖將自己從香港的處境中抽離，讓流亡的疏離經驗轉化為更積極的自我定位。半下流社會的現實便是認清「白晝與黑夜是交替的；光明與黑暗是淆混的；希望與失望是糾纏在一起的；理想與現實是並存的。」（1978：52）這樣矛盾的人生情境，在相互勉勵支持下，形成這群半下流社群的共同意識。等於說，遠離母土中國所生就的苦憶，在半下流社群裡，不再是如夜行鬼魅般的生活陰影，反而成為生活意識的實現。

他們用更為積極而激進的浪漫情懷來重新建構一個政治社群：屬於王亮及其流亡同代人的半下流社會。如此的人生戰鬥理想，也呼應了作者移居臺灣的「流浪漢哲學」所言：「滾動的石子不長苔，流浪的行業不聚財。身懷百技，隨遇而安，適應性強，而永遠囊空如洗，名利不縈於心，勇於遺忘。」（1980：1-2）或者也可以說，半下流社會的社群意識，是柔性戰鬥的階級意識，他們以「正義與理想」為社群的共名，控訴著流亡者的生存困境。趙滋蕃在《流浪漢哲學》是這樣說得：

在一個社會裡，如果把貧窮當作罪過，則法律與良心是衝突的；社會正義與社會理想是不並存的；這社會根本不是敗壞的，墮落的。事實上，窮人要活下去，這是我們的權利；讓窮人在生存中，繼續改善生活方式，這也是社會的義務。難道窮人連住天台都犯法嗎？難道窮人不是人嗎？

（1980：43）

這樣的腔調其實十分接近左翼文學的口吻，並且進一步凸顯出《半下流社會》在反共時代格格不入的特性。時勢使然，左翼文學曾是歷史上被消音的存在。論者往往以為左翼文學太過激進、天真而不具文學的藝術性，但是向來重視文學自主性、藝術性的反共名家夏濟安在美國版《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序言中卻持平討論左翼文學：

在西方文學的左翼文學發展中，左翼文學的衰退是因為作家邁向更成熟的發展，但是在臺灣與中國，左翼文學的衰退卻是因為政治的壓迫，這樣的情形造就出悲慘的結果：國策文學成為時代文學的主流。如今看來，雖然早期的左翼文學都因為將農夫、底層階級描述的太過美好而顯得天真，容易與社會現實脫軌，然而如今那些優秀左翼流派作品中所展現的嚴肅性，以及對於社會正義的熱情是值得懷念的。（1999：511）

反共的戰鬥文藝是時代的主調之時，文學創作有時會配合政治正確而陷入言不由衷的窘境。但是《半下流社會》卻能夠在時代給與的「反共」框架中求新求異，實數難得。它強調要追求社會正義的熱情，要展現生活的崇高與嚴肅性，相當具有左翼色彩。本文認為這樣的文學表現其實也直接鬆動了文學史所賦予它的「反共之右」。因此，若是要以反共小說為辨識符號，那麼《半下流社會》事實上更趨近於一部有所變形的反共作品。能夠在反共框架中表現出不那麼反共的特性，筆者認為是作品本身最重要的歷史亮點。

《半下流社會》是文學史上的反共小說名作，但卻也不是一部徹底的反共小說。論者慣用反共文學為座標去認識《半下流社會》及其同代作品。本文希望用另一種方式出發，去討論作品的另外面向。因此，不妨將《半下流社會》視為書寫流亡者在充滿冷酷考驗的異境空間之下，如何帶著理想求生存的一部樂觀政治

小說。在作品中，屬於正向能量的理想、樂觀、積極面向，都來自半下流社群成員對生活苦難的受容態度。如果將之與作者後期的文學論述相形比較，可以發現，《半下流社會》作為趙滋蕃的文學處女作，其實已然宣告了作者終其一身以創作與論述實踐的美學理念。如趙滋蕃在談論文學之美時，參照美國諾貝爾文學得主福克納（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的一段演說內容所指出的：

我相信人將不會只是忍受，他遲早總有勝利的一天。人是不會死亡的，這不僅因為人在一切生物中，聲音永不竭盡，而是因為人有一個靈魂，能夠同情，犧牲與忍受。（1978：34-5）

《半下流社會》構建了一個具激進浪漫情懷的政治社群，社群成員之間有共同意識。自中國流亡後，半下流社群成為他們新的家國。這個家國歷經酸秀才的死亡、李曼的離開與自殺以及故事最後的調景嶺大火等種種磨難。作者最後仍給予讀者在悲悽中始終保持樂觀、充滿希望的場面：「兩具棺材同時出殯，兩輛靈柩車分別載運了李曼和潘令嫻的遺體。在山坡上合葬的新塚，小丫頭從那墳上抓起一小撮黃土裝進她那裝著泥土的牛皮信封內。而王亮則是堅強起來，重新點燃希望地迎接接下來的人生。」也許人會被生活淘汰，但只要訴諸於社群意識的延續，就能不被歷史淘汰。這也許就是《半下流社會》在冷戰時代，在戰鬥文藝成為口號之時，對於主流所做出的抵拒。

劉紹銘在《香火相傳：1926年以來臺灣小說選集》的〈序〉中言道：

從1949年後到1950年代末期之前，（臺灣）都沒有嚴肅而值得的文學作品產出，因為政府「反攻大陸」的口號往往被逃難來的中國人解讀成，不僅只是表達他們「要回家」的決心，更是堅定的提醒臺灣並非他們的家。因此，儘管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何時可以搭上下一班回家的飛機，他們始終視自己或多或少像是在機場的「過客」。（1983：2）

劉紹銘所討論的「過客」情境事實上也適用於香港。香港向來被南來文人視為是斷裂的、暫時的時間與空間。但是，本文認為《半下流社會》卻展現了另一種過客的心態。故事中的半下流社群成員，僅有一部分人搭船到臺灣跟隨當時被認為是正統的中華民國政府。王亮卻帶著另一群流亡者，到港口送別，然後重新



回到調景嶺的半下流生活秩序裡。「過客」心態已悄然被王亮這群流亡者的選擇轉化為新的在地認同。他們心懷社會正義的理想，在自己的半下流烏托邦中追求生命的熱情。

身為半下流社會發言人的王亮，扮演著領導、大哥的角色。社群成員若有任何疑難雜症都會找上王亮商量、諮詢。王亮於半下流社會的意義也許就如同趙滋蕃與調景嶺流亡者的關係。周芬伶曾在一次演講「流放作家傳記書寫與研究」中描述趙滋蕃在調景嶺時是扮演兄長的角色，時常對身邊朋友有所提攜與照顧。由於任職於美新處轄下的亞洲出版社，趙滋蕃的薪俸與調景嶺朋輩相較之下豐厚許多。他總是將現金收於抽屜，誰有需要便直接取用。(2013)

王亮對於生活正義的追求，也可以反映在趙滋蕃以《重生島》寫出罪犯被非人道對待。但也因為這樣，趙滋蕃觸怒了港英政府，於是於 1956 年 9 月搭乘四川號郵輪抵台定居。值得注意的是，趙滋蕃曾為亞洲出版社主編，也是反共名家。因此，他雖寫出港英政府不鍾意的故事，還是能被反共陣營接納。小說中的王亮繼續在半下流社會中如英雄般地發光發熱，趙滋蕃則在政治正確與不正確的潮流中飄盪。他被記起多次，但也被遺忘多年。

半下流社群喻示了一個理想的國度，成員為維持社群的正常運作，無不盡心竭力。但是，跟集體理念對照，個人理念顯得無所適從。如，脫離半下流社群的李曼被社群成員視為「不再真實於真實」(1978: 104)。同樣位於流亡空間的《香港》顯現出另一幅強調個體在遺民異境的流亡者圖景。

### 三、 弱肉強食的政治邏輯：邱永漢《香港》

被日本媒體譽為股票神仙、賺錢之神的企業家邱永漢（本名邱炳南，1924～2012）也是文學者。在邱永漢傳記《我的青春·臺灣 我的青春·香港》中，提及了他接觸文學的歷程。當時就讀臺北高校時期的邱永漢，因為受西川滿影響而寫詩、短篇小說，並自掏腰包印製文學同人誌《月來香》(1996: 22-23)。1950 年代開始在日本發表小說，以中篇小說《香港》一作獲得日本文學獎直木賞的殊榮。在 1950 年代發表的作品裡，邱永漢描寫了活在戰前殖民地的臺灣人之悲哀、戰後臺灣的混亂。邱的日語小說刻劃了日治時期、國民黨來臺初期、香港冷戰初期的社會。如今這些小說大都已有中譯本，然而卻始終未受到文壇的重視。

岡崎郁子在其專書《臺灣文學——異端的系譜》中，以「戰後臺灣文學的原點」完整章節討論邱永漢的文學並賦予其極高的評價。雖然岡崎郁子對於邱永漢

小說中的金錢至上主義感到厭惡，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文學家的邱永漢的確曾認真地寫下許多被論者譽為「日語能力非常優秀」的作品。岡崎郁子甚而指出，邱永漢的文學與當時使用日語的臺籍作家如張文環、吳濁流相比，其「寫作短篇小說的表現力是出類拔萃的」（1996：100）。

《香港》先是刊登於《大眾文藝》8月至11月號，隨即獲得第34屆直木賞的肯定，也開啟該獎項中首位外國作家（邱當時仍為中華民國國籍，1980年入籍日本）的獲獎紀錄。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閱眾為日本讀者。在日本的華人以日文創作批判港英政府統治下的香港，對日本讀者來說也許是一件痛快而安全的事。

日本因敗戰而經歷七年（1945～1952）的美軍佔領時期。五〇年代的日本出現反美國基地的激烈抗爭，反美國、反西方、反帝國主義的聲浪充斥著日本社會。仇美之餘，同樣是同盟國成員的英國勢必也受到波及。對日本來說，美國既帶有侵略我國之惡，也有對戰勝者的崇拜。誠如東京大學情報學教授吉見俊哉所言：「過去在佔領期的美國，對某些人是解放者，對某些人是征服者；是欲望的對象，同時也是恐懼的理由。」（2013：15）日本對美國的愛恨情仇，在無法言明之下，便轉往其他對象進行情感投射。香港作為港英政府殖民地，是當時日本黑市商品重要來源城市。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帝國與資本主義的象徵。《香港》一作正好提供日本讀者一個曖昧情緒的投射管道：能夠把自己的痛苦投射在香港貧民身上，並跟著主角安全地痛罵帝國與資本主義。本文認為，這也許是《香港》能夠獲獎的原因之一。

不過，《香港》雖獲得獎項的肯定，卻未讓邱永漢一躍而成得以讓作品在報刊連載的文學家。可以說，日本文壇婉轉地拒絕了小說家邱永漢的進場，無論日本文壇或者臺灣文壇皆不買邱的帳。時不我與，邱永漢只得擱置起寫小說的筆，轉而開始寫作投資股票的文章，逐步邁向「大企業家」的道路。

《香港》寫出了冷戰時期的香港作為一流亡空間的景象。《香港》描述一名命運乖舛的臺籍青年賴春木，出生於一個半漁半農的村落。歷經公學校、嘉義農林學校後，大東亞戰爭爆發。日本政府以徵用為拓殖公司雇員之理由，將賴春木派遣至菲律賓，而後成為美軍的俘虜在戰爭結束後被遣送回臺。原本要回到原來的拓殖公司工作，卻又因國民黨接收委員安插了自家大小的職位，因而被革職。賴春木與其他被革職份子組成了反政府的組織，又因事跡敗露而被迫逃亡香港，以為能在香港重新開啟新生活，卻是面對更甚於臺灣的殘酷生存考驗。春木如同

難民般落腳鑽石山，原先冀望能依靠臺籍富商李明徵，未料傳說中的富商李明徵，竟是居住於貧民窟，其貌不揚、個性狡猾的老李。以為能在香港開創一番新天地的春木頓時之間再次失望，而面對在香港的生存問題，春木冒了許多風險，甚至從事了欺詐的生意。使得春木的內心不時出現掙扎的情緒。

即使最初是以政治思想犯之理由離開臺灣，對春木而言，理想的國度仍是那由知識份子所致力打造的政治之夢。因此，當春木在尚未見到同樣來自臺灣的洪添財時，就因友人周大鵬提及洪也是因政治因素流亡到香港之時，春木立即對於洪添財的「知識份子」、「政治亡命」事跡留下深刻的印象。春木甚至憶及故鄉時，想起他的伙伴之一被示眾槍決的場面，竟覺起伙伴的幸福：

他的伙伴之一被穿上寫著「共匪」的紅色背心，載在卡車上，從這條街到那條街遊街示眾。這位朋友是臺灣南部屈指可數的大財主的兒子。假使他是共產黨，而且凡是有錢人都樂意成為共產黨，這個社會早就成為更理想的社會了。無疑的，他恐怕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穿上紅色背心，恐怕到最後仍以為在做惡夢。於是，到了今天，可以說儘管他在台北車站前面的廣場，在眾人的環視下被槍決，但還是比春木更為幸福。（1996：49）

一方面，春木認定社會的理想狀態是抵達共產社會，另一方面，身陷殘酷泥窟的春木對於伙伴尚未對自身處境有所體認時即被處刑，投射出身為一知識份子的原罪，也即是，知的越多，苦難便越多，從這裡，也可看出作者邱永漢對於理想與知識份子是有所致意的。

與《半下流社會》相似，《香港》也間接構建了一理想的國度，而且這個理想城邦是可以通向共產主義的：

「生為人，必需要有錢。」老李環視四周說：「假使不能成為有錢人，就要做共產主義者。」（1996：141）

只是，雖然共產主義是條理想的道理，邱永漢對此並未描繪出左派革命的宣言。就算角色的思考都是從階級意識出發，但是共產社會的抵達是有條件的。它必須是在無法成為資產階級的情況下的選擇。也就是說，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的前提條件就是得在缺乏經濟資本的狀況下。然而一個共產主義者，是不具備「人」

的資格的。因此，《香港》所展現出來的流亡者認同，反倒趨向於一種「生存」的認同。《香港》的流亡者認同是關於「哪裡有路哪裡就是認同」的自我定位，是這樣如動物般的生存本能驅使才是《香港》所展現的認同。如同李明徵在茶樓與一群高等難民（小說中指的是上海人和北京人）為伍時，提醒賴春木的話語：

也許在不久之前，這些人（指茶樓中那些從中國逃出的右派高等難民）還是國粹主義者。也就是說，會成為左派的人也會成為右派。在窮鄉末路時人都很類似。我輕視這種人，但不責備這種人。因為我也不曉得多少次想依靠別人生存哩。（1996：141）

事實上，《香港》與《半下流社會》相同，兩部作品對香港皆未展露出好感。盧瑋鑾說過「香港的憂鬱，在於人們總不忘挖她的瘡疤」（1983：3）。然而在流亡文學、難民文學的時代風潮中，《香港》也同諸多香港的南來文人作品一般，建構了有關殖民想像、土地經驗的特定時空圖像。身為時代流亡者的邱永漢，藉由《香港》，反映了自身的流亡命運，小說無疑如同作家自畫像一般，帶有部份自傳性格與色彩。

相較於充滿激進浪漫情懷的《半下流社會》，邱永漢的《香港》雖也談論難民問題、生存問題，然而《香港》當中的弱肉強食邏輯是受到肯定的。而《香港》的中譯版本也在其封面頁以及書封上以李明徵的話語為題詞：

我們沒有任何保證，非得靠自己的能力活下去不可。我們得到的自由是滅亡的自由、餓死的自由、自殺的自由，都是屬於沒有資格做為人的自由。只有錢，錢才是唯一可靠的東西。（1996：88）

《香港》當中，處處皆是人為了最基本生存而掙扎的難民形象，因為當時聚集在香港的，大都是因應時局的流亡者：

眾所周知，香港這個地方沒有國民黨，也沒有共產黨。其實這個鑽石山也有國民黨的敗戰將官住在一起，但大家都是沒有差別的難民罷了。（1996：17）

身處於時代的夾縫，賴春木的心境是複雜而矛盾的，而這樣的心境或多或少也可以說明香港的處境。羅永生便說：「對不少香港人來說，冷戰對抗下周邊地區的政治高壓，正是促成人們遷到香港的原因，因此，香港人的冷戰經驗，脫離不了逃離、遷徙，在戰爭的大氛圍下找尋機會。所以，冷戰的歷史經驗對香港人來說，是充滿矛盾的，既是對抗也是逃離對抗。」（2007：265）

這段討論香港文化位置的論述，也適用於小說的情況：賴春木對於金錢至上主義的香港社會的態度、對於經歷二二八事件之後的臺灣社會的態度。這種「既對抗又逃離對抗」的姿態，反映在《香港》中即成為從異地遷徙至香港的，生活於半下流社會中的難民流亡生涯。

賴春木離開國家意識機器運作得正火熱的臺灣，來到了冷戰打斷反殖民思考的香港。看似他來到一個去政治化的新天地：各方的流亡者，各種意識形態，左、右派的鬥爭，全集中在香港。然而筆者認為，去政治化的香港，其實與亞洲的其他地區，如臺灣、韓國、越南、日本等地一樣，都充滿著政治化的課題。雖說冷戰環境使香港對於殖民主義的反思暫且擱置，然而冷戰環境更加強化了香港的殖民主義。等於說，殖民主義利用了冷戰環境，反而強行維持了香港的「去政治化」。邱永漢的《香港》縱然未有太多不同意識形態的深刻描寫，卻也從難民的最低生活標準：「求生存」的態度中，照見在這個披有「去政治化」軀殼的地理空間裡，潛藏著更多政治性的課題（如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二戰之後的日本對國際補給品的仰賴、左翼話語的消聲）。

《香港》一作確立了邱永漢的文學地位。但是，在得獎之後，只有月刊雜誌來邀稿，沒有一家報章來約他寫連載。邱永漢雖以日文為書寫語言，但是他的小說故事都發生在日本讀者陌生的國度，難以構成閱讀吸引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大概就能解釋何以邱永漢雖懷有文學夢，卻還是將筆轉向金融時事評論。若是想要在日本文壇繼續活躍，勢必得觸及日本文化社會的事物。由此，邱永漢開始在創作議題上轉型，並進而逐步成為文化觀察、經濟評論的代表作家。曾經，文學是邱永漢的人生夢想，但在屢次嘗試後，邱選擇了另一條能讓自己更亮眼的舞臺。這或許也是賴春木及其同代流亡者對生活所作出的回應：「因應時局只能先求生存」。只是，故事中的賴春木是留在香港茫茫地等待未來，邱永漢則是離開香港（其後期又移居香港則是以經濟發展為考量），在日本的評論界與企業界拓墾出自己的一條康莊道路。

#### 四、 結語

在兩部皆帶有作者自傳色彩的《半下流社會》與《香港》中，我們不僅看到一個描繪流亡者的文學作品，如何銘刻出流亡之地的殘酷異境。也看到了在香港這個看似去政治化的地理空間，由於它的生存挑戰太過嚴厲，反而凸顯了其政治化的一面，也就是本文所說的流亡空間。

《半下流社會》構建了一個具激進浪漫情懷的政治社群，社群成員之間有共同意識，無論人如何被生活淘汰，只要訴諸於社群意識的延續，就能不被歷史淘汰。這也許就是《半下流社會》在冷戰時代，在戰鬥文藝成為口號之時，對於主流所做出的抵拒。甚且，身為反共文藝的代表作品，《半下流社會》卻在反共框架中以具左翼色彩的社會正義關懷思維提昇自身的文學意涵，是不完全反共的反共小說。

《香港》一作寫出二二八事件之後的臺籍知識份子流亡到香港的生存困境，以及居於冷戰結構下的「緩衝空間」——香港——的其地其事面貌。不同於反共文藝的「正確」論調，《香港》訴諸弱肉強食的大自然生存法則。本文認為，在殘酷異境的時代，也許這樣的書寫，更能凸顯流亡者的人生事實。

在冷戰的年代，反共復國的主題是時代的主旋律，趙滋蕃與邱永漢分別以《半下流社會》和《香港》見證流亡者的面貌，有別於臺灣島內的反共大調，《半下流社會》和《香港》得以讓我們重新再傾聽來自海外的冷戰心音，不再想像單一的左右對立，因為在表面的冷戰底下，左與右的關係，比想像中複雜。

## 參考資料

### 英文論文：

1. Rey Chow, "Introduction: On Chinese as a Theoretical proble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ge of Theory: Reimagining a Field*. Rey Chow Ed., Duke Uni. Pr., 2001.
2. Joseph S.M. Lau, "Preface", *The Unbroken Chain: An Anthology of Taiwan Fiction since 1926*, Joseph S.M. Lau Ed., Indiana Uni. Pr., 1983.
3. Tsi-an Hsia, "Appendix: Taiwan", 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by C.T. Hsia, Indiana Uni. Pr., 1999.

### 專書：

1. 趙滋蕃著，《半下流社會》（香港：亞洲出版社，1953年11月）。
2. 趙滋蕃著，《文學與美學》（臺北：道聲，1978年2月）。
3. 趙滋蕃著，《流浪漢哲學》（臺北：水芙蓉，1980年9月）。
4.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香港》（臺北：允晨文化，1996年2月）。
5.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青春·臺灣 我的青春·香港》（臺北：不二，1996年1月）。
6. 黃康顯著，《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香港：秋海棠，1996年4月）。
7. 岡崎郁子著，《臺灣文學——異端的系譜》（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9月）。
8. 鄭樹森著，《從諾貝爾到張愛玲》（臺北：印刻出版，2007年11月）。
9. 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著，《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1998年）。
10. 陳芳明著，《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2011年11月）。
11. 周芬伶著，《芳香的祕教：性別、愛欲、自傳書寫論述》（臺北：麥田，2006年12月）。
12. 羅永生著，《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2007年）。
13. 王志弘編譯，《空間與社會理論譯文選》（臺北：自印，1995年）。
14. 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一九四一）》（香港：華風書局，1983年）。
15. 吉見俊哉著，邱振瑞譯，《親美與反美——戰後日本的政治無意識》（臺北：群學，2013年1月）。

## 期刊論文：

1. 老頑固（吳濁流），《臺灣文藝》第 39 期（1973 年 4 月）。
2. 陳芳明，〈在歷史的縫隙中——讀邱永漢《女人的國籍》〉，《聯合文學》第 11 卷 11 期（1995 年 9 月）。
3. 川村湊著，陳明台譯，〈歸屬和認同——比較邱永漢和吳濁流的作品〉，《文學臺灣》第 44 期（2002 年 10 月）。
4. 李昀瑾，〈自我認同的糾葛與分裂——以邱永漢《濁水溪》為考察對象〉，《臺灣文學評論》第 8 卷第 1 期（2008 年 1 月）。
5. 丸川哲史著，朱惠足譯，〈與殖民地記憶／亡魂之搏鬥——臺灣的後殖民心理地圖〉，《中外文學》第 31 卷第 10 期（2003 年 3 月）。
6. 張誦聖，〈臺灣冷戰年代的「非常態」文學生產〉，收錄於研討會論文集《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臺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2011 年 5 月）。
7. 陳建忠，〈1950 年代台港南來作家的流亡書寫：以柏陽與趙滋藩為中心〉，收錄於研討會論文集《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臺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2011 年 5 月）。
8. 羅永生，〈香港的殖民主義（去）政治與文化冷戰〉，《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67 期（2007 年 9 月）。
9. 葉蔭聰，〈香港新本土論述的自我批判意識〉，思想編委會，《香港：解殖與回歸》（臺北市：聯經，2011 年 9 月）。
10. 陳智德，〈一九五〇年代香港小說的遺民空間：趙滋蕃《半下流社會》、張一帆《春到調景嶺》與阮朗《某公館散記》、曹聚仁《酒店》〉，《中國現代文學》第 19 期（2011 年 6 月）。
11. 王宏志，〈我看「南來作家」〉，《讀書》1997 年第 12 期（1997 年）。
12. 張瑞芬，〈趙滋蕃的文學創作及其時代意義〉，《逢甲人文社會學報》（2006 年 6 月）。
13. 應鳳凰，〈在那激越的年代——「全國青年最喜閱讀文藝作品測驗」作為一份文本〉，《文訊》第 262 期（2007 年 8 月）。
14. 周芬伶，〈顫慄之歌——趙滋蕃小說《半下流社會》與《重生島》的流放主題



與離散書寫》，《東海中文學報》第 18 期（2006 年 7 月）。

#### 新聞報刊：

1. 聯合報訊，〈青年文藝作家趙滋蕃昨抵台：我文藝界熱烈歡迎 今起展開參觀活動〉，《聯合報》2 版，1956 年 6 月 26 日。
2. 關海潮，〈文明的海盜：盜印比老鼠會還像老鼠〉，《聯合報》12 版，1981 年 5 月 20 日。

#### 演講紀錄：

1. 周芬伶，「流放作家傳記書寫與研究」，2013 年 3 月 23 日（新竹：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
2. 盧瑋樂，「媒介現代：冷戰中的臺港文藝」國際學術研討會圓桌論壇，2013 年 5 月 25 日（臺南：成功大學人文中心與臺文系）。